

21.02 ✓

永川文史资料



第 一 期

1990年1-4月 (总四十四期)

Σ 44-47

一九九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永川永川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永川文塔的兴废.....蒋廷举 69 2286

永川文塔的兴废

蒋 廷 举

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浮屠就是塔。塔原是印度佛教的一种建筑，是高积土石以埋藏遗骨的坟，一般称作舍利宝塔。印度佛教还另有一种没有舍利的塔，它仅是一种纪念性的标志物。

中国的塔自印度传入之后，随着历史的发展，不仅在建筑式样上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独特风貌，而且还逐渐越出了宗教的领域，进入了世俗社会的天地，在人间发挥出与宗教毫不相干的社会功能。例如，到了明清，四川所建的佛塔便很少了，大多演变成了风水塔、文星塔、文峰塔、文笔塔、文昌塔之类，虽还叫浮屠，但已与佛教无关，而是借建塔以“弥补山川形势之不足”了。据说这样就可以保一方清吉，还可以在科举考试中多出些举人进士，永川南郊的文塔（俗称白塔）就属此类。有的塔更成了名城的标志，登临远眺的好去处，有的干脆就成了四海内的灯塔，名人的纪念碑。永川南郊的文塔，何尝又不是“昌州——合江”的标志，人们登临远眺的绝妙去处呢？

永川县境，北面以横亘的箕山为屏，南面正对黄瓜山尾麓。黄瓜山古称泸龙山，俗称王瓜山、黄瓜山，从县南的聚坡乡起，连绵七十余里，海拔600公尺，山体呈扇状，顶部平缓。解放前树木葱茏，林阴夹道，由于治安不靖，行旅稀少。山至城南五里的白塔坡而伏。

“若朝揖然”。看来此坡既高又是一个风水吉地。因此，县人就选中了这个宝地而且正对文庙中官建塔。显然这座塔就是为了装点山川，求保清吉，祈盛文风的文峰塔、文笔塔。在清光绪《永川县志·山川图》上正式标注的名称叫“文塔”。

此塔最早为明代隆庆六年（1572年）由永川知县王思民等倡建。明季兵燹后，砖石无存，仅余其址。经历199年之后，至清代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永川教谕彭滨倡诸生捐资重建。掘土得古碑，不仅知道这里正是古塔故址，而且还知道了始建年代。这个意外的发现，使众情欣慰，踊跃输助。经过一年的施工就落成了。塔的北面，刻有“三元文笔”四个大字。此后又经历63年，不知何故又复倾圮。至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再次由永川知县舒隆阿率邑人捐资重建。

塔基为长宽约5公尺，高约1.5公尺的石砌平台。塔立正中，高为22公尺，为楼阁式六面体砖塔。外表屋檐七级檐口由砖叠砌伸出，每级六角均悬铜铃。风动铃心下垂的铜鱼撞击发声，勾人遐想。塔身内外用石灰粉糊，外观呈白色。内室可登三层，按定制塔门开在南面。入门后由磴道按顺时针方向螺旋形上升，三层以上为实心。可登临的塔室都能从其窗孔向外眺望。北面仍嵌有石刻横书的“三元文笔”四字，笔力古朴遒劲。此外，并无佛像或其它宗教题识。

塔级不多，塔身也不算很高，虽算不上名塔，但塔地确实选择得

独好。此处地势高峻，南面背山，左右及北面开阔，如果登塔凭窗，北向可瞰永川城，远眺“萱花晚照”，南望群山，林木蓊郁，泛绿清溪，东西展望，成渝铁路、公路曲折平伸，永川河蜿蜒如带，沃野千畴，村舍万家，是永川县城近郊一个难得的登临胜地。而且以城为中心，无论从何方而来，只要望见白塔，即知已临近永川。笔者从小多次登览此塔，感受颇多，记忆犹新。

然而从1966年“文革”开始，祖国大地风云突变。在现代的迷信和愚昧的氛围中，装点了永川山川且又如此傲岸的文塔自然就在劫难逃了。

20年后，笔者访问了文塔第三次受毁的有关当事人。

永川文塔地属城郊区大南公社管辖，当此破“四旧”的高潮中，公社里有的干部深感破“四旧”的革命行动不应后人，而且也惶恐于面对“四旧”不革的责任重大，经请示区里同意，即于是年11月某日，专门组织部分民兵，调用了修水利的爆破药械，于夜间对文塔实施爆破。由于塔筑非常牢固，炸药用量尚嫌不足，只在下层炸开了一个窟窿。对此危塔，为了安全就更需要彻底摧毁了，于是再次进行爆破。重遭132年后的文塔终于又一次变成了废墟！

废物不消说会被立即派上用场的。大部份碎石用去修了棉花仓库，其余的便被附近社员搬去垫了猪圈，修了茅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永川经过十多年的积极建设，开拓前进

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人们在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也渴求精神生活的充实和满足。城里人每当阳春三月郊游踏青，秋高气爽重九登高，乃至其它闲暇追尋野趣之时，常会勾起对永川南郊昔日的登临胜迹——文塔的怀念。加以在其遗址近邻，最近又重新出现了一座香火旺盛，游人不绝的大佛寺，就更易使人由此及彼，惋惜永川文塔的消逝，希望它有朝一日的重现。对于发展永川旅游事业，关心市民文化生活抱有浓厚兴趣的一些人士，曾于今年初雅集大佛寺，对重建文塔的事情作了一番论证规划和倡议，笔者有幸参与了这项活动。愿望是否能够实现，看来还相当渺茫。不过总算有人提出了这个课题。这篇短文，也就聊作“立此存照”吧！

一九九〇年三月

永川文史資料

第 二 期

(总四十五期)

政协永川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六月二十日

李吉康事略

黄一德

649102

李吉康事略

黄一德

李吉康(1887—1962)永川县柳溪乡(1953年4月以前属铜梁县)人。1906年左右在铜梁巴川中学结业,考入重庆府中学。以其成绩优异,深受杨沧白校长器重,誉为“青出于蓝”。毕业后加入同盟会,并在其组织领导下活动,甚为积极。

1917年,吉康在巴县任典狱长和在永川邮务局任译电员之后,转任永川县知事。时护国军兴,奉筹军费20万元,并以百分之二十作酬。吉康筹齐之后,丝毫不留,全部上缴,以供军需。

1922年,吉康任永川县知事。体恤民艰,廉洁奉公,深受人民爱戴。离任时,县民赠以“清慎勤廉”金字扁额一道,悬于大堂,以资纪念。

1923年,吉康任川汉铁路基金筹备会秘书,协助胡文瀾策划成立川汉铁路基金公司,不遗余力。后因胡受排挤,影响筹备会职工薪金发放。吉康乃率全体同仁请愿,经月余奔走,卒获圆满解决。

1923年—1927年,吉康在新20军郭汝栋部任秘书,后调奉节县任市政坐办及巫溪县知事。当时,地方军阀苛捐杂税繁重,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激起人民反抗。他们打起“红灯教”旗号,大举造反。凡青壮年中不甘坐以待毙者,大都参与其中,以求一线生

机。红灯教教规强调国术操练，凡刀枪剑棍等项目，无不研习，更出阵前，由主教画符祈神，戴上迷信意识，所谓刀枪不入，教徒易信。数月之间地方团练武装，纷纷被其摧垮。吉康曾对笔者谈及：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亦介入其中活动。声势日益浩大，川东闻为之震惧，乃派正规部队前往清剿。在清剿中教徒被屠杀者不计其数，而被生俘或涉嫌者则交与县府监狱关禁审理。吉康以市政坐办，县府知事职责，对这些人操有生杀予夺之权。他深悉这些人为“我”之由，不忍加害。一俟部队移去，即择其中声誉较有影响者公开判以死刑，而行刑时间则选定深夜，并令其亲信为监斩官，漏告知犯人向空鸣枪，让死囚逃向远方。这样，既掩当地士绅耳目，又可上结案。至于情节较轻者，则令其通通取保释放。

1933年，吉康从奉节任上返乡探亲，在家短暂休息。适值春荒发生，饿殍载道。吉康所在区本尊寺早有赈济组织，设有备荒粮仓一口，起名积社仓，储有黄谷七、八百（老）石，为原区长李汝衡掌管。他对饥民非但不予同情，反而乘机肥私，在将积谷米发赈时，掺和河沙于白米之中，从而护大仓余数，借以渔利。饥民抱怨，敢怒而不敢言。吉康得知此事，经查属实，遂发动板桥镇之无产者刘明午，带领饥民捣毁积社仓，尽分积谷。李汝衡即向县府报告，指空刘明午系共产党，图谋借灾聚众捣仓兴事。县府连夜派差将刘领拿归案。吉康即赶往县城，向县府说明真实情由，反控李汝衡乘灾贪污。县

府素知吉康声望，汝衡诬控饥民揭竿，遂将刘明轩释放回家。汝衡乃向有关方面行贿疏通，县府亦不追究此案而了之。

1934年，吉康任渠县秘书。当时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曾攻占渠县，国民党第20军杨森部遭到很大打击。后来红军转移仪陇、昭化、广元一带，杨森趁机反扑，回到渠县。在战争过程中，杨部也曾捉了不少共产党人及其涉嫌者交与县府处理。地方方始收复，前知事已逃去，新知事尚未派来，遂由秘书主持政务。吉康仍以当年对待被俘红军将领的处理办法——假枪毙一批，取保释放一批，不上三个月，遂形结案。笔者曾问吉康：“要是泄漏怎么办？”他说：“判决乃军法官的事，必须在判决书上签字。军法官要听我的，怎能泄漏？”此事吉康任李远科于解放后在重庆一旅社与同室渠县旅客互问姓氏乡关时，知远科为假释李氏，乃问知否吉康共入，远科一一具答。客自述在当年曾蒙吉康庇护，得以假枪毙而脱险，互为感激。此为远科向笔者道及者。

1938年，吉康受聘重庆广益中学，授国文课程。在讲坛上每论时事，态度“偏激”。指责正面战场抗战不力，节节败退，大后方国民党要人大发国难财，醉生梦死。因而引起特务监视，被迫返乡休养。

康返乡后，不与地方权势周旋，不与名门望族往还，日每上街在茶馆和进步青年或正直人士叙谈时事。他长期订有《新华日

报》、《新蜀报》和以后的《民主报》张贴于袁家酒馆门前，供众阅览。他在言谈中，寄抗日胜利希望于游击队，寄建设新社会希望于共产党。有人因不理解共产党，曾问：“李知事，共产党杀人、放火，不认父母是真的吗？”他笑咪咪地回答：“那是反宣传。我认识的共产党人中，就没有一个是不认父母的，杀坏人，敌人有之，放火则是恶毒中伤！”

1949年，板桥地下党组织大量发展，以迎接西南解放。有人观察吉康言行，认为思想进步，拟介绍加入组织。刘其鸣同志约同笔者登门叙谈。吉康知我辈意图乃明确表态：“地下党的事，我决不破坏，若有什么事要我做的，我当竭力协助，我不参加组织，同样可为新中国做些工作。”

解放初期，吉康对党和政府的政策，做了不少的宣传工作。1956年永川县政协成立，被推选为常委。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摘帽”，旋即病逝，1979年正式纠正。

黄一德同志为中共地下党员。1934年撰就此稿并曾改写，后复口头补充。今一德已逝世两年矣，特整理刊印，聊作纪念！

——编者

永川文史资料

(第三期)

(总第四十六期)

政协永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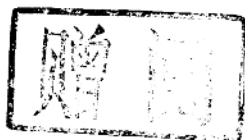
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曾听秋医师二、三事

邱志云 6/9/62

我所知的永川烟毒调验所

韦鸣珂



曾听秋医师二三事

邱志云

名医曾听秋，笔者曾师事之。其名已载《永川县志》，惟志书限于体裁，仅能举其荦荦大者。当此提倡医德医风之际，特再举二三事之可为后世法者以述之；非敢讥评今世，聊补正史之不足矣。

先生学名德坤，生于1885年旧历10月26日，殁于1961年旧历4月，享年76岁。

前清季年，废科举，兴学校，先生毕业于成都优级师范（师大前身）。鼎革后，历任永中校监，生理卫生学教员，永川官医馆医药学校第一班（即第一期）校长，秀山县征收局长，重庆治平中学、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川东师范教员，永川南华小学校长，永川县中医师公会第一、二届理事长，永川县参议会参议员（医师公会推举）等职。解放初期，任永川县医务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并兼任秘书组组长。1952年2月，参加联合诊所后，工作不懈，直到世逝。

先生性情开朗，好动不好静，喜参加社会活动，常为邻里族党排难解纷，解放前有“无事忙”之号。毕生好学不倦，能画（擅长荷花）、能琴（七弦琴）、能棋、

能唱（川戏），但皆不精；从学从政皆无殊誉，而独以医道名于世。

先生原配孙氏，生子女8人，多夭折，先生愤而学医，广交医林人士，从名医曾范廷学中医内科，并曾求教于邛崃名医郑钦安、成都名医何仲皋等。1919年，永川成立官医馆时，先生以业余爱好者，积极襄助筹组工作，后由董事会聘为第一班（期）校长（义务职，对外联络官绅，筹募经费）。先生研究祖国医学，主张经方、时方并用。在馆兼授《温病条辨》，另一业余爱好者蒋锡九（退休县知事）教《时方歌括》，自后永川遂有经方派、时方派之分。

1934年，汪逆精卫在“中政”会议上，大肆叫嚣废止中医中药，致使群情愤激。先生时执教渝城，即与重庆名医唐良春，张乐天及在渝永川医药界人士唐月清，蒋芸石，陈显达等发出“快邮代电”，通电全国中医，共同奋斗，挽救民族医学，在医卫界颇为震动。当时惟恐遭受迫害，皆未用真名，于今日久事湮，知此事者，亦仅知发动者为永川人，实不知即先生矣，故特表而出之。

有中医疡科张学五者，颇有名，染阿芙蓉癖，衣衫褴褛，不自振作，常向先生借钱不还，先生无吝色。赠

之新衣，卖而吃鸦片烟，先生又赠之，无愠色。于是张氏喜，收先生为徒，以其技倾囊相赠。先生亦尝谓麻油嫩膏、莲花丹、五福丹、七星丹等，得自张氏八辈人不外传之秘。故先生不特内、妇、儿科有名，即疡科亦有名。时人戏称之为“多宝道人”。

1952年永川城关成立第三联合诊所时，适逢土改结束，先生挂上地主牌子，不便动员参加。当时卫生科军代表姜乐亭认为：党的政策是宽大的，没有规定医务工作者协会的地主会员，不准参加联合诊所，何况曾听秋为当地名医，遂亲往其家（在联合诊所对门），动员先生立即入所，补报申请，先生至为感动。故1954年冬，政府撤消第三联合诊所时，该所医生郭遇良首先退伙单干，惟先生独排众议，自愿挑重担，重新成立集体组织，遂将联合诊所更名为康民诊所，一切规章制度不变。整整一年，每月工资，不过比大家多得4元而已。固然“走社会主义道路好！”而姜乐亭对先生之影响，恐亦不无关系。

城关镇米市、菜市，有几年没在木货街，天不亮而卖菜农民毕集，致诊所天亮开门即有病人来，先生亦来，在先生带动下，只好都来。尤其热天，常常十点钟后（本地时间）才吃早饭，病人见先生年近七旬，敬之，

买来醪糟蛋之类早点奉上，先生谢之，借口有病不能吃，实则为病家着想，少花费用；且此例一开，众皆效之，必损医风。同事们和病人都深为敬佩。

先生最不乱开补药、贵药，更不喜病人指名要药，无病吃药。此类病人，常碰钉子，说他脾气大，看病潦草，其实不然。先生门诊，不能分身，所有出诊，概由笔者代往。所记回之病历，先生反复察看；脉证机情，反复询问；对所拟医治方案，亦详细斟酌后，始准开方发药。常说：“你不要乱开单子，免得坏我名声。”先生长于治小儿急惊，用药虽平易而适中病机，屡获奇效。常常夜间起来应诊两三次，随喊随到，并无怨言。故其业务，至死不衰，其名声亦不因系五类份子而减，死近三十年，至今人犹称道之。兹就记忆所及，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一）1949年解放前夕，某日午后，先生因事出东门，见其同宗侄女，已停尸堂前，正燃灯化纸。问之，因崩症血脱，按之，脉息已无，但胸前尚有热气，心区似微微颤动。先生对其侄婿说：“死马当做活马医，我家有关东参一支，速取来！”取来后，以小半截令侄婿嚼烂，和唾液纳入病人口中，用开水徐徐灌下；大半截用细火浓煎，频服。俟先生出东门，事毕归来时，病人

已睁眼矣。先生即处方取药，后遂康复。其侄婿家贫，医药完全奉送。但1950年药王生日，仍提雄鸡一支来谢。

(二) 1952年春，小儿患麻疹者众。某日午前，英井路运输工人俞某，抱其长女来说：“人民医院不医了，请曾老师救治。”时，候诊者众，先生正处方中，立即投笔而起说：“重病先看。”见病孩已牙关紧闭，面唇发青，喘促鼻煽，确属麻闭肺炎危急之候。先生立即处麻杏石甘汤加味，时吃樱桃，命笔者将樱桃核打碎作药引子，并嘱俞某先用乾净青布一块，用二道淘米水洗净口腔后，以筷子撬开牙齿，不拘道数，频频喂服，每次二三汤匙，但得微汗出，麻疹必然复现，便有救了。果如其言，前后三诊，药费不多，诊所得挂号费旧币3200元（合人民币三角二分）。病家当时虽贫苦，但负担不重而女儿得活，今常谈及，犹有感激之情。

(三) 1953年盛暑某日午前10时许，有人用滑竿抬一病人来说：“是疔疮，乡下诊所和人民医院都不医了，特来请曾老师医救治。”笔者与外科何相维诊视，见病人乃一彪形大汉，满脸悉肿，右侧面色乌紫，人已昏迷，右太阳穴及右颞皆有药棉纱布蒙着，先生令将病人扶在椅子上靠好后，才叫何医生揭纱布。但见颞颥动脉上血液射出如线，先生即令用冷水打湿帕子，围后颈，

并另帕搭前额。初上丹药，血即冲脱，仍上丹药，并急以麻油膏药贴之。血仍渗出，先生即于怀中摸出百解一块（又名解草，出贵州沿河一带者方真，现药肆中多有伪者），令病人家属磨浓汁涂膏四周。初而热气腾腾，随涂随乾，随乾随涂，有顷，此处血止。再令磨浓汁即服，同时处方护心散加减。并说：“如午后得大便下秽物即脱险矣。”病人乃住诊所对门旅店。午后三四点钟，病家来说：“病人下燥粪甚多，睁开眼，呻唤矣。”黄昏，病家又来说：“病人又复下便，思饮食矣。”先生令吃绿豆稀饭。第二日，续处方内服。第三日，病人完全清醒思食，乃换外敷药，疮口浸血已止，即带内服药二付，抬回农村。过三日，病人走来换药，给膏丹药两次，回家自换。总共初复诊4次，诊所得挂号费旧币4200元，内服药钱亦不多，至于膏药丹药，则系先生开广生诊所剩余之物，免费付与，病人千恩万谢而去。

当年誉先生者，说先生救逆办法多；讥先生者，说先生医病胆子大。笔者认为最关要者，乃先生具有一颗治病救人、对病人负责、不计报酬、不计个人毁誉之心。盖当时医疗条件，较之今日，相差何止十倍，而危急病人，救治之机，稍纵即逝，再一推托，延误治疗，极易造成恶果。推托者固不负其责，而病家岂不受其害？如

≈6≈